

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

——兼答马振犊先生

余子道

八一三淞沪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重大会战，其规模之巨大、时间之持久，在八年抗战中实属罕见，值得治史者作过细的研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举行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是怎样的？淞沪战役开始时，南京统帅部是否已经作出了把全国对日作战重心从华北南移，以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决策？当时蒋介石是否提出了诱使日军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些问题时研究淞沪战役时首先需要回答的。我在本刊1992年第3期曾提出一篇文章，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粗浅的论述，并对台湾同行们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的意见，以期引起两岸史学同行们的讨论，加深对这一史事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南京马振犊先生在本刊著文，对拙作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将有助于淞沪战役研究的深化，是值得欢迎的。

一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统帅部举行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淞沪战役所需要揭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先生的文章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其结论是：“国民政府发动淞沪战役，具有引敌南下，迫使日军变由北南进为由东西进的战略意图”，并且认为蒋介石关于淞沪战役的上述战略意图，是与抗战前两年间作出的以西南为未来抗日后方基地的战略构想“一脉相通的”。因而，在马先生看来，“蒋氏集中兵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是有充分设计的，是避免日军主力

从河南、山西渡黄河南下的战略谋算”。^① 我以为，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举行淞沪战役有其战略意图和目的，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以为它并非像马先生所说的那样是改变日军的作战方向为“由北而南”到“由东向西”，也不认为蒋介石举行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与其以西南为抗战基地的构想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对于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这是需要从军事、政治、对外关系以及经济等等诸方面进行考察的。只有对这个意图和目的之复杂内容作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其真实面目。而且，分析这个意图和目的不能是“一锤定音”，只有从发展变动中才可把握其实质。

从总体上说，淞沪战役期间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担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等人的忆述材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统帅部的意图和目的：“上海一战，对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因为有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② 刘斐等人的亲历忆述，真实地反映了举行淞沪战役的目的，此种战略企图在当时大本营中是占着主导地位的。

就淞沪之战具体的战役目的来说，在前期是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

^① 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页。

及经济策源地(上海),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①;在中期是以“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对登陆之敌“限制其发展”,“打破其包围企图”,加以“各个击破”为作战目的^②;在后期则是以“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为作战目的^③。

在探讨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关于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和目的时,有两个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以淞沪之战来吸引日军的相当部分的主力部队于淞沪战场,这是该战役的战略企图和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就是为了“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淞沪战役开始前后,蒋介石与南京统帅部对战局的大体判断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将以速战速决为原则,其战略部署,将集中兵力以华北为主要战场,背靠东北和平津向南发展进攻,首先夺取华北;以一部兵力由冀察西进夺取绥远,切断中苏联系,并深入山西控制华北屏障;以一部兵力封锁沿海,夺取上海、青岛、海州等沿海重要城市,威胁甚至夺取首都南京。^④鉴于在华北作战,日军凭借东北四省为基地,又有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两支在大陆盘踞已久的部队,并可使用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发挥其优势,形势于中国军队不利,因此统帅部企图以扩大沪战来吸引敌军一部分主力。

淞沪战役在发动时和它的前期,南京统帅部一方面确认华北战场为全国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以吸引敌军。其主要目的在于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有利于减轻华北我军所受压力,并得以调整部署和进行抵抗,同时也包含有在江南作战在兵力集结、交通运输、后勤供应、作战地势等方面比在

① 大本营训令第四号《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6页。

② 大本营训令仁全字第3号《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300页。

③ 《淞沪抗战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1月1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331页。

④ 参见大本营训令第二号《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3—4页。

华北，于我方较为有利的考虑。

蒋介石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① 这是他对淞沪战役作战意图的一次表白。淞沪战役期间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黄绍竑，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蒋介石对淞沪战役的决策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八一三”事变爆发，“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②

显然，从蒋介石和黄绍竑在战后的总结和回忆中可以证实，淞沪之战确有吸引敌军兵力、牵制敌军在华北的进攻，打乱其预定计划的意图和目的。但是，说当时蒋介石已经设定了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由北而南”为“由东向西”的“战略谋算”，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这只能说是马先生的一种推测，并无任何事实根据。

第二，以淞沪战役促美、英、苏等大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促成国际方面进行和平调停，这也是蒋介石的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所谓“以战略促政略”的策略。淞沪战争爆发后几天，在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龙云等人一次谈话时，汪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道：“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③ 在沪战进行期间，蒋氏夫妇频频发出要求国际方面干预中日战争的呼声。8月31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国际间对

① 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1938年1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一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9月版，第65页。

② 黄绍竑：《五十回忆》，中册，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403页。

③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4页。

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并宣称“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中国不仅在外交上有所动作，而且对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蒋介石为了以“打”来“促”成国际干预，否定了不少高级将领提出的沪战应当贯彻“持久消耗”原则、适可而止的建议。在9月间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但蒋介石、宋美龄等却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①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谈到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时指出：“（蒋介石）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②可以说，以上海的军事行动促使国际方面进行干涉，蒋介石的这一意图是贯彻于沪战的始终的。

二

关于蒋介石是否有过改变日军的作战方向为由“从北而南”到“由东向西”的战略意图和决策，马先生的文章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没有举出任何一个史实以资佐证，所以他的结论难以令人置信。

我们从至今已见的当时大本营和军委会发布的命令和指示中，从蒋介石本人的讲话和著述中，从何应钦、冯玉祥、陈诚、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张发奎、薛岳等参与指挥淞沪战役的主要将领的回忆材料中，从当时大本营主管战略计划和作战命令的作战部

① 《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非卖品），1981年12月初版，第13页。

②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6—197页，其中“一二百万军队”是当时未经精确统计的一种说法。

门负责人员的回忆中,都未见到在当时有过什么诱使日军改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的战略意图和决策。台湾的一些研究民国史的作者,虽然一再著文,声称早在 1937 年 8 月蒋介石就已提出了上述决策^①,但他们并未举出任何一条无可争议的史料,以致他们的结论难以令人置信。

当然,据马先生的解释,在当时,“既然这是最高统帅部的秘密军事谋略决策,没有留下公开的文字资料,也许会是保守军事机密的缘故”。但是,马先生的这个假设,恐怕也是难以站得住的,因为在战后,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当年参与军事机密的主要将领都未说过有这样的一个重大决策。

抗日战争结束后,当年参与“八一三”淞沪战役最高军事决策的陈诚,在其所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中,对淞沪战役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这份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年南京最高统帅部举行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辩明当时是否提出过诱使日军改变“由北而南”的作战方向为“由东向西”的决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先将陈诚的论述转录如下:

我以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

^① 蒋纬国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一文中,说蒋介石在 1937 年 8 月 7 日作出了国军主力集中华东,“迫使日军转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的决定;在《抗日御侮》第三卷中,又说在 8 月 20 日作出了“国军主力集中华东”的决定。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也说是在 8 月 20 日作出了“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的决定。蒋永敬在《对日八年抗战之经过》一文中,说蒋介石在 8 月 6 日的国防会议上宣布“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但是上述论著都没有说明其依据的原始材料是什么。

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①

从陈诚在1946年以参谋总长的身份所作的上述回顾和总结，我们可以判明，南京最高统帅部调动大军举行淞沪战役的意图，主要有以下三项：（一）从政略上说，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都市，而且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乃“中外观瞻所系”，而“国际观感”尤为重要，当然更包含着以上海之战来引发西方列强的干预这一目的在内；因此，最高统帅部乃决定“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二）从经济上说，“上海乃我经济重心”，聚集于上海的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利益，无论如何是需要保护的；而且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工厂、物资也需要在对日作战的掩护之下，向内地转移。这也是“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的一个目的。（三）从军事战略上说，中国军队在长江流域对日作战，比之在黄河流域较为有利，因为，中国军队“以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对日）行决战”，而且“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陈诚对淞沪战役战略意图的记述，与当时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等人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陈诚的回顾和总结中，人们没有见到当时南京最高统帅部作出过诱使日军的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决策。从陈诚的书中，人们倒可以明白无疑地看到全国作战重心南移的由来。在当时最高统帅部看来，由于“上海乃我经济重心”，由于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由于“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作战）较为有利”，“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非卖品），第9—10页。

由华北移到华中”。这就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全国作战重心南移华东的原由和背景。在这里，蒋介石当时具有引诱日军主力到长江流域来作战的意图；但是所谓改变日军作战方向为“由东向西”的决策，却并未提出过。至华东日军一度出现由上海向西仰攻的态势，那是战局演变的一种结果，并非是蒋介石在事先设计的“战略谋算”的体现。同样地，随着淞沪战局的推移，吸引侵华日军主力到淞沪战场，打乱了它的进攻计划，使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这也是战局演变的“结果”。正如陈诚的总结所说：“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

在马先生的文章中，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以及蒋百里将军等关于四川和西南为抗战后方基地的建议，以及蒋介石“以西南为后方”的抗日战略构想，以此作为证明蒋氏举行淞沪战役，确有“引敌南下西进”，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的意图和决策。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以四川和西南为抗日后方基地的战略构想与当时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并由此把日军诱至“由东向西”，这两者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马先生文章对此并无论证，而只是作了一种推测。是不是有了以四川和西南为抗战基地的设计，就一定会作出以淞沪战场为全国主战场，引诱日军改变其作战方向为“由东向西”的决策？至今并无任何论据能够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马先生想以四川和西南为抗战基地的构想，来证明当时蒋介石作出过“引敌南下西进”的决策，是没有说服力的。

以一般战略原则而言，如果真正要实施以西南诸省为后方基地的持久战略，那就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敌进行决战，主动地诱敌深入，待机反击。如此，则不应在淞沪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实行消极防御，举行没有胜利把握的决战，以致使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之多。蒋百里将军是主张以西南作为抗日后方基地的，但他并不赞成把我国军事主力置于第一线与敌军硬拼的。早在抗战前，他就撰文指出：对于“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指日本），

“我们……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则用持久之方法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则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无用处。”^①按照这一战略观点，是决不会主张在上海这样处于第一线前沿的地方，集中全国主力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战役持久战的。

事实上，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即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沪宁、平津、山东等地区对日作战方针的建议：“现在战局扩大，各方情势不同，就大势而言之：沪宁方面，敌人不利于使用大部陆军，我方应取速决主义，不宜多控制预备队于后方，使敌能得以少数兵力，牵制我大部兵力。平津方面，敌人仍将集中优势兵力，我方应取持久主义，兵力应有纵长之配置。山东方面，敌人所以尚未发动者，大约因平津方面未有南下企图之故，则此时正宜竭力构筑阵地。”^②这一建议，主张我国用兵重点应置于华北方面，实行“纵长配置”；至于淞沪战线，则主张实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即所谓“速决主义”，而避免被敌人牵制我大部兵力。看来，蒋介石并未采纳蒋百里的建议。

在当时担任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完全了解蒋介石以四川和西南为抗日后方基地的设想，但他并不认为集中全军主力于淞沪战场作战是适当的。在回顾淞沪会战时，他曾说道，“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战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③

① 《蒋百里先生全集》，第四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 6 月版，第 152—159 页。

② 蒋百里：《对日战局判断》，《蒋百里先生全集》，第一辑，第 7 页。

③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版，第 120 页。

三

马先生的文章认为，蒋介石在发起淞沪战役时，就已经确定了把全国作战重心由华北南移华东，将淞沪战场开辟为对日作战主战场的决策，甚至断定这是在事先已“充分设计”好了的战略计划。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蒋介石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战场，调集重兵举行大规模会战的决心，是在“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逐步形成的。

“八一三”战争爆发时，蒋介石虽然批准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下令对上海日本驻军进行围歼，但他并无一个在淞沪地区举行一场大战役的计划，也未组建一个足以适应指挥一场大战役的领率机关。他的策略可以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战指导方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当时，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大本营，在 8 月 20 日正式颁发的全国抗战指导计划中，明确规定全国作战的主战场在华北，而不是在华东的上海。在《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以及《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等文件中，正式规定：全国“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① 在这稍前，何应钦代表军委会于 8 月 7 日向国防最高会议所作的“中央之军事准备”的报告中，宣布全军部署的重心是在华北。其中指出：“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约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依照序列，使用于河北省，共约五十师”。全国的武器弹药，“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屯积三分之二，江南屯积三分之一”。“至中央空军，亦已全部准备出动……以太原

^① 大本营训令第一号《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7 年 8 月 20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 12 页。

为根据地。”^①由此可见，在“八一三”抗战爆发前后的一个时期，南京统帅部决无以淞沪战场为全国主战场的决策，因此，说当时最高统帅部已作出“把全国作战重心由华北引向华东”，“全国军队主力集中淞沪战场”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先生文章中举出了用来直接佐证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作出上述决策的两件史料：一件是1937年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并为蒋氏所接受的建议，另一件据说是南京军事委员会8月20日发出的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这两件史料是马先生文章中仅有的用来直接说明其结论的根据。但这两件史料能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呢？在我看来，回答是否定的。以下，我想就马先生所举的两件主要史料作些分析。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于8月18日派陈诚和熊式辉赴上海视察战况。陈、熊于20日返回南京向蒋介石作汇报，陈向蒋建议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对此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即调任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开赴上海增援。^②陈诚是参与蒋介石最高军事决策的国民党主要高级将领之一，他的上述回忆材料对于研究淞沪战役所具价值自不可低估，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台湾的一些学者都把陈诚的上述记述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认为蒋介石接受陈诚的上述建议时，就作出了全国军队主力集中华东，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以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的决策。马先生的文章也持同样的看法。

但是，从陈诚的记述材料中引出上述结论，未必是妥当的，甚

^① 《何应钦关于中央军事准备报告稿》（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第261—262页。

^②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军事委员会战史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至是对陈诚记述材料的臆断。显然，陈诚的建议之基本点在于：日军如在华北得势，必将沿平汉路南下直攻武汉，针对战局这一发展的可能态势，我方应当“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这个建议并未提出要把全国军队主力调集到上海地区，也未谈到要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而只是要求“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以“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众所周知，以一般军事原则而论，战略全局中的“牵制”方向，是与主要作战方向相对而言的。陈诚的建议，对于淞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是使用“牵制”一词，显然是以华北战场为主战场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以当时陈诚的主张而言，淞沪战场对于华北战场的关系，还是处于“牵制”的地位。蒋介石接受陈诚的建议，确立了扩大沪战，以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但是从陈诚的建议中，无论怎样也看不到有全国军队主力集中上海、把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主张，这是很清楚的。至于说，后来全国军队主力集中于淞沪，这里成为全国作战重心，那是在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这与蒋介石接受陈诚的建议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说蒋、陈在 8 月 20 日就已作出了这样的决策。因此，我以为对陈诚建议的本意，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论断，而不应随心所欲地加以臆断而言过其实。

马先生文章特别提到，在 1937 年 8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过关于作战方针的命令，以作为其立论的一大根据。他写道：“8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规定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这项指令发布后，长江以南我军停止北调，纷纷向淞沪战场增援，中央军及各地方军陆续开抵淞沪地区。”^① 如果南京军委会确实如象马先生所说的那样在 8 月

^① 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2 期。

20日下达了上述作战方针的命令，马先生的论断倒是有根有据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南京军委会并未发布过这样的命令。马先生用来作为立论依据的，是一件以讹传讹的史料。

马先生引用的所谓军委会8月20日作战方针命令，乃是转引台湾作者虞奇所著《抗日战争简史》一书^①，而虞奇并未在其书中说明这一命令的原始材料，系出自何处。在虞奇的著作发表之前，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书中^②，在这以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第三卷中^③，也有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说法。但是，目前根据已有的材料查明，无论是虞奇、蒋纬国或是吴相湘，他们著作中所说的8月20日作战方针命令的内容之最初的出处，乃是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一书。何应钦在1946年4月发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其中并无关于作战指导方针的内容。1955年9月，何应钦在台湾将《八年抗战之经过》加上增补，增写了“战争之指导方针”的章节，更改书名为《八年抗战》重新出版。在这本书中，何应钦把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这个时期的作战指导方针表述为：“以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要点，重垒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特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掩护首都”等等。^④台湾一些作者所说的8月20日军委会下达的作战指导方针，都是从上述《八年抗战》一书中有关内容直接引述和演绎而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何应钦这里所说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他根据“七七”至武汉失守这个时期战局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抗战结束十年后的1955年所作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何应钦的书中，绝未说过在1937年8月20日发布过上述作战方针命令。以后台湾一些作者却把何应钦1955年所作的关于作战方针的概述，说成是在1937年8月20日已经发布了的

① 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7年9月版，第135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5月版，第388页。

③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三卷，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5月版，第101页。

④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2年9月第三版，第13页。

作战方针，这不能不说这是严重的失实；在方法上是以结果演绎原因，导致其结论与历史事实相背离。马先生信以为真，从虞奇的书上直接引来，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依据，其结论自然也就难以成立了。

而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国民政府的正式档案编印的，南京大本营 1937 年 8 月 20 日以蒋介石的名义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战略计划和作战方针的命令，都明白无疑地规定全国主战场在华北，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像虞奇的书中所说那样，那岂非南京军委会又在同一天、在同一问题上，发布了与大本营命令相反的另一种方针——全国主战场在华东，试问有这种可能吗？

四

淞沪战役从开始一直到形成为一场大规模会战，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它是从小规模战役逐渐演变成了大规模会战的。这应该是我们观察淞沪战役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海内外有一些论者认为，淞沪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大会战。他们的看法是，蒋介石在 1937 年 8 月的决定一经作出，从此淞沪之战就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蒋纬国将军在其专论中写道：蒋介石在 8 月 7 日作出了“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转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的决策后，“自 8 月 13 日起，国军在空军支援之下，先后投入七十个师及七个旅猛攻淞沪之敌”，主战场随后就“由华北移到华中”。^① 马振犊先生也认为，南京军委会 8 月 20 日的作战“指令发布后，长江以南我军停止北调，纷纷向淞沪战场增援，中央军及各地方军陆续开抵淞沪地区。8 月底，在陇海线东部机动待命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以及由汉口向保定输送，先头部队已抵达郑

^① 蒋纬国：《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一册，第 546 页。

州的第十八军，均奉命转赴华东战场，这就形成了在淞沪汇集重兵展开大战的态势”。海外的有些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学者也有相似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在淞沪之战开始之前，国民政府已调集了几十万部队进入淞沪地区，一开始就是有计划地要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例如美国的齐锡生教授这样写道：“中国政府在 1937 年‘八一三’前夕，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的所有精锐，全数投入淞沪战场。”^①

然而，笔者却以为，淞沪战役的规模并不是在开战之前或开战之初就已设定了的，事实上它是由一场规模较小的战役逐步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会战的，其战役作战企图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日双方经过逐次增兵、轮番增援，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会战，这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淞沪战役最后发展成为如此巨大规模的会战，这是敌我双方统帅部最初都未预计到的。

蒋介石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的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1937 年 7 月底，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鉴于上海战事决不能免，于 30 日向南京统帅部提出我军“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即采取“先发制敌”的方针，蒋介石同意这一建议。8 月 11 日，蒋介石下令张治中部向上海围攻线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之战。这时，由最高统帅部命令规定：由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只有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浦等地担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② 张治中就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

^① 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7 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7 页。

^③ 《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电》（1937 年 8 月 13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 286—287 页。

阶段的规模。

淞沪战役开始时的作战企图和目标,也不若以后那样广大,而是以围歼上海市区(虹口和杨树浦)之敌,守备海岸,阻敌登陆为作战目标。这样的战役企图,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正如张发奎指出的:“战争初期,我军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上海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市区之敌,并打破其沿海登陆之企图,允属至当。”^①这就是淞沪之战开始时的战役规模和作战企图。由此可见,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就是投入了数十万部队参战的一个大战役,甚至认为发起沪战时已“充分设计”好了把敌军主力吸引于淞沪战场的“战略谋算”,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当然,随着日本进攻的不断扩大,全国抗战潮流的高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南京统帅部对全国全盘战局构想的日益发展,蒋介石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18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十八军进入淞沪战场。20日,蒋介石接受陈诚的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并于同日颁发《第三战区作战计划》,正式提出淞沪战役“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②8月2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此前,张治中统率的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九集团军,继续担任围攻上海市区之敌;张发奎统率的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8月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开始在川沙口和吴淞登陆,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攻击登陆之敌。至此,战局已从虹口、

^① 《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第13页。

^② 《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页。

杨树浦扩大到吴淞、宝山、罗店一带，遂真正演变为“淞沪”战役。8月25日，蒋介石调任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秉承蒋的旨意统一指挥淞沪战役。^①这时，中国参战部队已扩展到三个集团军以及空军和炮兵的主力，一场大战役的局面已初步出现。

淞沪战役的第二次大规模增兵是在9月中旬前后形成的。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8月下旬至9月间调派了陆军两个师团又一个支队进入淞沪战场，但攻势进展不大，战局呈现胶着状态，乃决定再次调派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空军一个团前来参战。这些部队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登陆。至9月20日前后，日军除在上海附近的海军部队外，在长江和黄浦江沿岸集结有陆军五个师团，另十五个大队，共约12万人，拥有战车两百余辆、飞机两百余架、火炮三百余门。日军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条件已趋形成，大规模会战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

同时，中国军队这一期间在上海北郊对登陆之敌血战两旬，虽阻滞了敌之攻势，但仍未击退敌之进攻，至9月中旬，后撤潘泾河阵地，转入阵地防御战。9月12日，第九集团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顾家宅之线，同月17日，第十五集团军退守双草墩—罗店西南—庙行一大场之线。淞沪战局的严重形势和国内外的种种情况，促使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以新的更大的规模举行淞沪之战。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三战区领率机关，由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的作战军，左翼集团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九集团军和第十八、第六十一师等，右翼集团辖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总兵力约为五十多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自9月17日起，敌我在北站—庙行—刘行—罗店西南—浏河

^①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他于8月15日抵苏州，设司令长官部，但不负实际指挥之责，由顾祝同另设副司令长官部，负责统一指挥。

之线，开始互相争夺之阵地战，至同月底我军后退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浏河之线，接着敌向蕴藻浜南岸大举进攻，攻势直指大场。至 10 月 25 日大场陷落，我军中央集团和左翼集团于 10 月底向苏州河南岸后退。在这期间，敌我双方继续增派部队，战役规模进一步扩大。至 10 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 20 万人。中国方面，蒋介石在 10 月间又继续增调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军团等部队。至 10 月底、11 月初，我方在淞沪战场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上下。10 月会战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会战，终于形成为淞沪战役的高潮。

淞沪战役真正演变成为全国的主战场和作战重心，是在 10 月间。对此，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主编的《大本营陆军部》都持一致的看法，认为在 10 月间，作战重心才转移到淞沪战场。这个论断是符合事实的。《抗日御侮》一书写道：“至 10 月（日本）已对淞沪地区投入七个师团的兵力，战况进展仍不理想。此时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部长极盼在上海方面能获得所望之战果，乃决定将主作战由华北转移至华中。其大本营遂将在中国东北待命之第十八师团及华北方面军之第六、第十六师团及国内之第一一四师团，后备步兵两个联队，均准备使用于上海方面。”^①《大本营陆军部》一书记述，10 月 20 日，日本大本营以“临参命”第 119 号下达组成第十军增派上海的命令，“这样，华中方面兵力为两个军的九个师团，华北方面为两个军的七个师团。主战场显然转移到华中，敌我的主力形成对峙。”^② 马先生在文章中说：日本统帅部在 9 月 5 日已决定把主作战由华北转移到上海方面，此时，“我方在事实上已达到了‘引敌主力南下’的战略目的。”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①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三卷，台湾黎明文化公司 1987 年 4 月版，第 167 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6 页。

蒋介石对淞沪战役的指挥违反了“持久消耗”的战略原则。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前线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和南京统帅部内一些高级幕僚长官,都提出过积极的建议,要求贯彻持久消耗战略方针,避免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和战役决战,应当适可而止,逐次转移战线。先是张发奎和张治中,后来又有白崇禧和刘斐,都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李宗仁也向蒋氏进言,但都遭到拒绝。张发奎回忆道:“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蒋介石)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①

蒋介石由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寄希望于几个大国干预中日战事,在军事上又实行单纯防御的方针,在淞沪战役的中期和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的原则,没有适时调整部署,保存有生力量,而是在敌陆海空军便于协同作战、重兵器极易发挥威力的上海近郊一片平原地带,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与敌军拼消耗,以致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损失。正如美国的中华民国史专家易劳逸教授所指出的:“蒋介石的战略是建立在‘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有时,例如在上海,他并未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②陈诚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谈到此战的经验教训时也指出,“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很大,乃是国家的不幸”。^③

因此,在评价蒋介石在淞沪战役中的作用时,既不应抹煞他决策和指挥淞沪之战对于民族抗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不应对其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避而不谈。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其在这一史事上的功过,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评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第7页。

② [美]易劳逸:《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604页。

③ 陈诚:《1938年2月28日在武昌的讲演》。